

酒、鬼、堂吉诃德

——上海与鲁迅的“且介亭”杂文

谭宇婷

【内容摘要】 “且介亭”是鲁迅在上海“半租界”所居住的亭子间，隐喻着他“姑活”的心态和介入现实的“战取”姿态。“酒”作为逼仄空间的苦闷的象征，不仅贯连着鲁迅的人际交往，还投射出危机处处的都市生活情状。走向坟之路的“鬼”，暗含着严酷的政治和文化围剿下鲁迅内在的心态变迁。对堂吉诃德式的做戏行为的评述，作为鲁迅的抗争方式，寄寓着其对启蒙即救亡的观念的坚守。都市空间中多重物象的化合作用，形塑着鲁迅对“时代的眉目”的感应和攻守方式。

【关键词】 且介亭 酒 鬼 堂吉诃德

【作者】 谭宇婷，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。（南京 210023）

【基金项目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“鲁迅与左翼美术运动研究”（25CZW072）

何来“且介亭”

要探讨“且介亭”的现实视景，可以先关注1934年12月21日鲁迅所作的《阿金》。其中记述女仆阿金的“主人家的后门，斜对着我的前门”。此时的鲁迅住在施高塔路130号大陆新邨9号，阿金的住所便是新邨第一弄的“留青小筑”。让“四围的空气也变得扰动”的阿金，甚至让鲁迅“文章做不下去”“书译不下去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鲁迅杂文中描述的邻近的闹嚷，与现实情状存在龃龉。留青小筑由大陆银行在1933年10月始建，周期180天。鲁迅在1933年4月11日搬入大陆新邨时，“前面有块空地，雨后蛙声大作，如在乡间”。这份静谧被自1935年11月6日访问鲁迅家后，“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邨来”的萧红所记录，“院子里不怎样嘈杂”，夜里“全弄堂一点什么声音也听不到”，“喊娘姨的声音没有，在楼梯上跑来跑去的声音没有”。^①大陆新邨的环境是安静的。

^① 萧红：《回忆鲁迅先生》，上海：生活书店，1948年，第24—30页。





① 许广平：《景云深处是吾家》，《文汇报》1962年11月21日。

② 鲁迅：《340409致姚克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3卷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68页。以下鲁迅的论说凡正文有出处的不再另作注释，均引自《鲁迅全集》2005年版。

③ 鲁迅：《且介亭杂文·序言》注释9，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，第5页。

④ 鲁迅：《自选集》自序，《鲁迅全集》第4卷，第469页。

与《阿金》中“照常的嚷嚷”相吻合的，则是“景云里二弄末尾二十三号”的居住状况，不仅有绑匪与警察的枪战、顽童的投石放火，还“有唱京戏的，有吵架的，声喧嘈闹”，“加之隔邻住户，平时搓麻将的声音”，“迫使鲁迅竟夜听他们的拍拍之声，真是苦不堪言”。^①由此可见，被收入《且介亭杂文》的《阿金》并非完全写实，其背景环境的营构融聚的是鲁迅对上海的整体感观，即“乱烘烘的小世界”，“房子像鸽子笼”。在这样的“是非蜂起之乡，混迹其间，如在洪炉上面，能躁而不能静”。^②“且介亭”也并非单指鲁迅生前最后一处住所，还涵盖着虹口区的景云里、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，以及避难时暂住的花园庄旅馆、千爱里三号、内山书店等。“且介亭”这一具有社会空间感的表述，是鲁迅拆字的结果。他在上海的亭子间生活，大多位于“‘越界筑路’（帝国主义越出租界范围修筑马路）区域，即所谓‘半租界’。‘且介’即取‘租界’二字之各半”。^③

在厘清且介亭指涉的现实空间后，可以注意的是它的象征蕴含，即“姑活”的心态和对现实的切实介入。1934年1月11日给山本初枝的信中，鲁迅说“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猖獗，青年常失踪。我仍在家里”，“只要是平安无事，就姑且活下去罢”；1933年6月25日的信中则说“只要我还活着，就要拿起笔，去回敬他们的手枪”。如果说前者折射的是自称“死的‘随便党’”的鲁迅蛰居上海的逆旅心态，那么，后者体现的便是在此心境驱使下“绝望的抗战”的“战取”姿态。“姑活”不同于苟活，前者不会为活着而放弃原则，甚至在准备随时不活的情况下认认真真地活。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后记》中，鲁迅查勘自“写《随感录》起，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，共历十八年，单是杂感，约有八十万字。后九年中所写，比前九年多两倍；而这后九年中，近三年所写的字数，等于前六年”。这便是“自视亦如轻尘”却拼命工作的鲁迅，在“沪上实危地，杀机甚多”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为“且介亭”刻下的真实注脚。“杂感”的文学形态投射的是“打杂”的工作状态和焦躁的旅沪心情。1933年10月21日致曹靖华的信中，鲁迅称“文学史尚未动手，因此地无参考书”；12月27日他给台静农的信中再提“明年颇欲稍屏琐事不作，专事创作或研究文学史，然能否亦殊未可必耳”；1934年12月6日致萧军、萧红的信再次表达烦闷心情，“到上海后，即做不出小说来”。鲁迅一直有着写文学史和专事创作的打算，却只能在“颇以为苦”的现实情境中以琐碎的杂感针砭铜弊。

问题在于既是对“且介亭”的生存环境感到不适，鲁迅却没有选择离开上海到更安逸的地方生活，甚至还回绝时任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教务长的陈此生的高薪聘请。在探讨其缘由前，可以先关注鲁迅不得不离开依恋的“朔方”而南下之因。一方面，当时作为五四运动策源地的北京，已是“寂寞新文苑，平安旧战场”，新文化阵营分化，“《新青年》的团体散掉了，有的高升，有的退隐，有的前进”，^④北洋政府的文化控驭更是让鲁迅“荷载独彷徨”。另一方面，1926年“三一八”惨案后，鲁迅因写系列文章谴责军阀政府，而被列入3月26日《京报》的“通缉的名单”。之后他避居莽原社、山本医院、德国医院、法国医院等。当然，政治的压迫外，还有个人因素，即鲁迅要“公开自己的恋情”。1925年10月12日，鲁迅在其编的《国民新报副刊（乙刊）》中发表许广平的《同行者》，文中便说“只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面奔驰”。

但上海可能从来不是鲁迅积极主动的选择。1926年8月30日，鲁迅曾致信李小峰言及上海并非自己的安居地，客寓时他便“急于想走”。其后因在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中，与一些现代评论派人物发生矛盾，1927年1月16日，鲁迅离开“死海”厦门，前往广州，被任命为中山大学

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，这顶纸冠让鲁迅忙碌到“不但睡觉，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了”。^①4月12日国民党在上海发动政变，以“清党”为名捕杀共产党人。4月15日广东的形势也恶化，中山大学学生四十多人被捕。鲁迅召集紧急会议提出营救学生，而后辞职，于9月27日乘上北上客轮。抵沪后，“想寻一点饭”的鲁迅“心里是走着瞧”，仍“没有定居下来的念头的”。^②

在鲁迅看来，“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，而也可以由此得死”的“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”，^③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，而他最终“苦捱”于上海，不仅有着不得不栖身于荆榛的无奈，还因为上海在大革命后是全国的文化中心。各种文化思潮、政治势力汇聚上海，对鲁迅来说这里是适合发声与战斗之处。更重要的是，鲁迅不愿向国民党当局和文坛鬼魅示弱。1933年7月11日给山本初枝的信中，鲁迅说“我现在也不能离开中国。倘用暗杀就可以把人吓倒，暗杀者就会更加跋扈起来。他们造谣，说我已逃到青岛，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，并且写文章骂他们，还要出版，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”。1936年8月23日，也就是鲁迅在去世前一个多月写作的《“这也是生活”……》中，记叙自己病中醒来仍惦记“外面的进行着的夜，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。我存在着，我在生活，我将生活下去，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，我有动作的欲望”。^④这也是他以且介亭作为“战士的日常生活”空间的关键原因。这姑活的心态与切实的行动“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”，而在这样的场域里“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，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”。^⑤

在窥察且介亭的空间指向、象征蕴含和存在的意义后，本文还试图借助酒、鬼和堂吉诃德三种文化符码考察以下问题：一是鲁迅在上海具体面对着怎样的外部环境；二是与北京时期相比鲁迅的内在心态有何种微妙变化；三是他是以何种方式保持对现实的介入。

“旧帽遮颜过闹市，破船载酒泛中流”

酒不仅是鲁迅在上海日常生活中的片光零羽，也投射着“破帽”与“漏船”般的都市情状。“闹市”之感，鲁迅1927年10月3日到上海后便亲历亲逢。一系列的宴请，让鲁迅在10月21日致廖立峨的信中说“熟人太多，一直静不下，几乎日日喝酒”。据鲁迅日记记载，抵沪当晚他“往陶乐春夜餐”，次日“邀三弟及广平至言茂源午饭”，5日“夜小峰邀饭于全家福”，6日“午达夫邀饭于六合馆”，7日“饮于言茂源”，8日和9日都是在“中有天饭”。在1925年曾对许广平说“到现在为止，真的醉只有一回半”的鲁迅，到上海后酒局颇多，且醉酒的记录也不少。1927年10月23日，他与孙春台、周建人等“上新亚楼啜茗，春台又买酒归同饮，大醉”，11月9日“食蟹饮酒，大醉”。郁达夫对鲁迅到上海后的饮酒种类有过记述，“大抵是黄酒了。但五加皮，白玫瑰，他也喝，啤酒，白兰地他也喝”，^⑥另外还有汾酒、威士忌、薄荷酒、苦南酒、葡萄酒、杨梅酒、郁金香酒等。酒贯连着上海时期鲁迅的日常交往和人情世故。

在“且持卮酒食河豚”的点滴欢愉外，鲁迅的心境更多的是“岁暮何堪再惆怅”。^⑦这惆怅一方面体现为洗尘的酒宴与繁琐的应酬下，鲁迅“不能静，殊苦”，“至于创作，却一字也做不出来”的情状；^⑧另一方面，则是与阴差阳错的现实处境与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息息相关。北京时的鲁迅“太高兴和太愤懑时就喝酒”，他在《这是这么一个意思》中曾表述自己数年之前的喝酒“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”。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中说司马懿不杀阮籍，因其饮酒“与时局的关系少些”。寓居上海的鲁迅，则常借着“饮后大醉”表达对现实“刺戟”的不满。1929年

① 鲁迅：《270225致章廷谦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2卷，第21页。

② 许广平：《景云深处是吾家》，《文汇报》1962年11月21日。

③ 鲁迅：《〈尘影〉题辞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3卷，第571页。

④⑤ 鲁迅：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，第624页，第624页、626页。

⑥ 郁达夫：《郁达夫文集》第4卷，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香港：三联书店香港分店，1982年，第212页。

⑦ 鲁迅：《鲁迅全集》第7卷，第462页。

⑧ 鲁迅：《280710致翟永坤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2卷，第121页。



的南云楼风波便呈现出“靠版税在上海维持生活的鲁迅”的敏感与焦虑。北新书局长期拖欠鲁迅的版税，此事在郁达夫等人的交涉下得以调解。8月28日李小峰在南云楼做东请吃饭。“忠厚诚实的林语堂”于席间偶然提起经营春潮书局的张友松（此人曾讽刺李小峰对作者欠账不还），郁达夫记述，有酒意的鲁迅“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，是对鲁迅的讽刺；所以脸色发青”，大概想“声明并非由第三者的某君挑拨的。语堂当然也要声辩他所讲的话，并非是对鲁迅的讽刺；两人针锋相对”。^①郁达夫等调和下，这场小风波才“安然流过”。后来林语堂回忆“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，疏离者二次，其即其离，皆出自然，非吾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”，“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，而为离合之迹，绝无私人意气存焉”。^②林语堂的描述更说明在“骂鲁迅是‘公事’”的上海文坛，鲁迅的斗争“实为公仇，决非私怨”。彼时多有人希望以鲁迅为梯来造声势，鲁迅则说“后起诸公，真能由此爬得较高，则我之被踏，又何足惜”。^③

酒作为载体，投射出鲁迅在上海此种境遇下所受的闷气，及其瞻前顾后的孤独与酸楚。1927年11月9日，创造社的郑伯奇、蒋光慈、段可情，在郭沫若的支持下拜访鲁迅，希望联合办刊，鲁迅欣然应允。然而1928年1月15日《文化批判》的创刊号上即发表了冯乃超的《艺术与社会生活》，称鲁迅“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，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”；5月1日《创造月刊》第1卷第11期登载成仿吾的《毕竟是“醉眼陶然”罢了》，说鲁迅“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，而且同时还在‘醉眼陶然’”；5月15日《戈壁》第2期上刊载叶灵凤的漫画，画着鲁迅瑟缩在写有“绍酒”的大酒缸后，并附图说“阴阳脸的老人，挂着他以往的战绩，躲在酒缸的后面，挥着他‘艺术的武器’，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”。对于创造社的刀剑齐鸣和辞峰尖酸，鲁迅用《“醉眼”中的朦胧》《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》《上海文艺之一瞥》诸篇条分缕析地回应。有意思的是，在与创造社的论战中，鲁迅发现创造社成员与晚清上海市民在精神气质上的共通之处，即“才子+流氓”，尽管前者以反叛的姿态出现。创造社的才子气体现于他们“神气十足，好像连出汗打嚏，也全是‘创造’似的”，^④而“流氓”则是“没有一定的理论，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，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”。^⑤瞿秋白称创造社作家为“薄海民”（Bohemian），具有都市化与摩登化的特质，“和农民的联系更稀薄了，他们没有前一辈的黎明期的清醒的现实主义，——也可以说是老实的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”。^⑥在创造社希冀“获得大众”却将“革命”和“大众”理想化、凝固化而丧失自身批判品格时，鲁迅将这些“革命知识阶级”置于十里洋场的城市形态下加以描摹。1928年8月10日所作《革命咖啡店》展现一幅“洋楼高耸，前临阔街，门口是晶光闪烁的玻璃招牌”的社会镜像，革命咖啡店作为一切都招牌化的都市产物，既意味着现代文明的咖啡，又被冠以“无产阶级的革命标签，这在上海滩算得上“一举两得的买卖”，这样“理想的乐园”中的楼上的“名人”的高谈、沉思，实则是远离“齷齪的农工大众”的“种种好玩的把戏”，这些革命的买卖与“躲在咖啡杯后面在骗人”的把戏，是“并不想到实行的”。^⑦虽然鲁迅指出这些年轻人的思想幼稚，却深知他们不同于歌颂升平与粉饰黑暗者，所以后来创造社成员认为应团结鲁迅时，他仍不计前嫌。

上海十年，酒所牵引的周遭环境还有“杀人不见血的武器”，即谣言。1934年12月6日致萧军、萧红的信中，鲁迅说自己“其实是不喝酒的；只在疲劳或愤慨的时候，有时喝一点，现在是绝对不喝了，不过会客的时候，是例外。说我怎样爱喝酒，也是‘文学家’造的谣”。谣言作为未经证实的消息，是变相的社会舆论的表征，是将荒诞合理化的现实环境的投影。造谣

① 郁达夫：《郁达夫文集》第4卷，第220—221页。

② 林语堂：《悼鲁迅》，《宇宙风》1937年第32期。

③ 鲁迅：《300327致章廷谦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2卷，第226页。

④ 鲁迅：《伪自由书·前记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5卷，第3页。

⑤ 鲁迅：《上海文艺之一瞥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4卷，第304页。

⑥ 瞿秋白：《瞿秋白文集 文学编 第三卷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113—114页。

⑦ 鲁迅：《鲁迅全集》第4卷，第117—118页。



上海鲁迅故居（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）

者“出奇的幻想”和“别致的描写”实则是“险恶的构陷”。1934年2月25日《盛京时报》称“左翼作家鲁迅近染脑病，亦不能执笔写作”，此消息便是上海文氓所为；3月16日鲁迅给台静农的信中说“诅咒而今翻异样，无如臣脑故如冰”。谣言让鲁迅不得不花费时间向忧心他的母亲和友人解释。它还丑化鲁迅的形象，引起社会的恐慌，如微风文艺社1934年7月25日决议“声讨鲁迅”等各项提案，谩骂鲁迅为“文妖”，并准备“呈请党政机关严厉制裁”。“暗示当局”的还有《人言》周刊，其称鲁迅“被本国迫逐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”。^①彼时鲁迅将《火》《王道》《监狱》三则短评发表于《改造》月刊，上海文氓将《监狱》译载并说鲁迅以日文来“逃避军事裁判”。文公直也在笔伐时称鲁迅为“汉奸”。^②1934年5月6日《社会新闻》登载《鲁迅愿作汉奸》，说“丐其老友内山完造介绍于日本情报局，果然一说便成，鲁迅所获稿费几及万元”；后刊《内山完造底秘密》称内山书店“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”，鲁迅“是探伙的头子”。这些“亲日”的罪状饱含杀机，“受日人万金而作，意在卖国”的污蔑，更是“衮衮诸公及其叭儿”“竭力别求卖国者以便归罪”^③之行。谣言中也不乏“官意”。国民党官办刊物《时事新报》曾刊登小说《一个普罗文学家》，含沙射影地说鲁迅加入左联是为“额外的卢布津贴”。其目的是让鲁迅成为“人民的公敌”，进而束缚其言行，让其话语丧失效力。1932年10月12日，鲁迅作“旧帽遮颜过闹市，破船载酒泛中流”。“旧帽遮颜”的狼狈与谨慎，凸显闹市上海的危机处处与人心浇薄。“破船”隐喻的是“故乡黯黯锁玄云，遥夜迢迢隔上春”。“酒阑人静暮春时”的鲁迅，将“酒”作为逼仄空间的苦闷的象征，并赋予其感时忧国的内蕴，进而与“有害的事物”相抗争。

“忍看朋辈成新鬼，怒向刀丛觅小诗”

如果说“酒”寄寓着鲁迅在现代都市空间中安置自我的方式，那么，“鬼”则影射着他在曲折的外在环境中的心态变化。在1927年9月4日赴沪前的《答有恒先生》中，鲁迅便说“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‘救救孩子’似的议论，连我自己听去，也觉得空空洞洞了”。与北京时期的杂文相比，鲁迅在上海“且介亭”所作杂文更显得沉静、冷峻、老辣。可将1926年4月1日所作的《纪念刘和珍君》和1933年4月1日发表的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相对比。在听到刘和珍遇害的消息时，鲁迅多次用排比、反复和对照的手法，以及反问和感叹的句式，来表述无以言表的震惊和伤悼，“四十多个青年的血，洋溢在我的周围，使我艰于呼吸视听，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？”“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！”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是鲁迅在国民党当局1931

者“出奇的幻想”和“别致的描写”实则是“险恶的构陷”。1934年2月25日《盛京时报》称“左翼作家鲁迅近染脑病，亦不能执笔写作”，此消息便是上海文氓所为；3月16日鲁迅给台静农的信中说“诅咒而今翻异样，无如臣脑故如冰”。谣言让鲁迅不得不花费时间向忧心他的母亲和友人解释。它还丑化鲁迅的形象，引起社会的恐慌，如微风文艺社1934年7月25日决议“声讨鲁迅”等各项提案，谩骂鲁迅为“文妖”，并准备“呈请党政机关严厉制裁”。“暗示当局”的还有《人

① 鲁迅：《准风月谈·后记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5卷，第410页。

② 鲁迅：《花边文学·序言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5卷，第437页。

③ 鲁迅：《340602致曹聚仁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3卷，第132页。



年2月7日杀害柔石、殷夫等五位青年后才作,与北京时期听闻噩耗后激愤交加的抒情、议论相比,此时的鲁迅选择更多地记叙自己与这些青年交往的往事与心迹。甚至在见到柔石狱中写给同乡的信时,他想的也是“天气愈冷了,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?”在得知柔石被枪毙时,鲁迅只写下一行“原来如此!……”简单的四字加上叹号和省略号,表露的是不动声色的悲痛和欲说还休的酸楚。与七年前叙写的惨状相比,鲁迅对诸如“竟”“最”“尤”“居然”等程度副词的使用明显减少,哀恸与心疼却溢于言表。“惯于长夜过春时”的鲁迅,不再直抒胸臆地惊叹“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”。如果说北京时期的鲁迅体悟到的是“真的猛士,将更奋然而前行”,那么上海时期的鲁迅则不再对“徒手的请愿”保持旁观的态度,而是拉近自身与事件的心理距离,更切近地解读到“柔石的拳拳的心”及其“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”。“在悲愤中沉静”的他,写下“忍看朋辈成新鬼,怒向刀丛觅小诗”。

丸尾常喜将“鬼”解释为“人”的阙如状态,认为鲁迅“孜孜不倦地探求着‘鬼’变成‘真的人’的‘翻身’之路与自身生命价值的实现——即他自身走向‘坟’的路”。^①字面意义上的“新鬼”指在黑暗势力下失去生命者。其凸显的时代背景是《“碰壁”之后》里“充塞着重迭的黑云”般阴惨的现实。1933年9月20日作的《礼》中,鲁迅记“新鬼大,故鬼小”,“而新的几个之归于淡漠,则只好以俟将来”。^②“新鬼”走向坟之路,是其实现生命价值之路,也是“绝望之为虚妄,正与希望相同”之路。“新鬼”不仅寄寓着反抗绝望的精神姿态,也隐喻着鲁迅自身与现实之间紧张的对峙关系。敛心静气地“忍”,所关联的是严酷的政治围剿。1933年12月27日致台静农信中,鲁迅说“三十年来,年相若与年少于我一半者,相识之中,真已所存无几”。许钦文在1933年8月被以“组织共党”等罪提起公诉,再次入狱后,鲁迅曾托蔡元培营救。1934年许获释后,鲁迅在信中说“钦文出来了”。1934年5月1日鲁迅记“丁玲被捕,生死尚未可知”,11月12日再记“丁玲还活着”。1934年7月台静农、穆木天被捕,鲁迅致郑振铎的信中说“静事已闻”。1933年鲁迅以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,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题赠瞿秋白。这位“少说话多做事的青年”1935年被捕,6月11日鲁迅给曹靖华的信中说“它兄的事,是已经结束了,此时还有何话可说”。瞿秋白就义后,“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悲痛不已”的鲁迅,写信给萧军说“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,秋即其一”。“朋辈成新鬼”不仅是私仇,也成为“因悲而愤”的鲁迅与黑暗社会相抗争的公仇。

关键是鲁迅自身在半租界的环境中,也并非完全安全。增田涉曾记述被通缉的鲁迅“断然拒绝了行政院长会见的邀请”,“如果同行政院长合作,对他的迫害立即就消除了”,还有一次,走在路上的鲁迅忽然对他说“后面有个奇怪的家伙钉梢我们。你先回去,我要在这附近甩掉这条尾巴”。^③被跟踪之外,书籍被扣或信件被拆也是“日常茶饭事”。给鲁迅寄的信件“一被查出,发信人就会危险。书是常常被邮局扣去的,外国寄来的杂志,也常常收不到”。^④鲁迅的通信地址是“Mr. Y. Chow, Uchiyama Book-store, 11 Scott Road, Shanghai, China”,稿费信件都由内山书店代转。内山书店因是日本人所开,而成为兼具经济、政治和文化功能的隐秘场所。它为住在半租界地带的鲁迅,提供与外界交往的通联处。但鲁迅仍“随时都有受到迫害的可能”,“鲁迅先生在上海几次避难,几乎都是托内山先生代为安排的,一次在花园庄旅社,一次在内山书店楼上,一次在四川路四马路(就是现在的福州路)口内山书店分店里”。^⑤1934年内山书店两个中国职员被捕,鲁迅自8月23日起避居千爱里内山完造家,9月中旬返寓。他多次在信中以生病来暗指避难经历,如9月4日致王志之的信中说“再有十来天,大约可以全愈,回到家里

① 丸尾常喜:《“人”与“鬼”的纠葛:鲁迅小说论析》,秦弓译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0年,363页。

② 鲁迅:《鲁迅全集》第5卷,第322页。

③ 增田涉:《鲁迅印象记》,《鲁迅在上海(三)》,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编印,1979年,第97—98页。

④ 鲁迅:《341112致萧军、萧红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13卷,第256页。

⑤ 王宝良述,荣生记:《鲁迅先生与内山书店》,《文艺月报》1956年第9期。

去了”。国民党反动派想除掉鲁迅，又因其文化影响力而不敢，还曾试图劝其离开中国，1936年7月13日李秉中以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用笺”询问鲁迅“东行已有期否”。^①跟踪、恐吓、通缉、劝说在鲁迅这里都不起效，他保持着“与黑暗捣乱”的反抗姿态。李霁野曾记述鲁迅对自己安危的态度，即“危险自然是有的，作战那里有万全的事？国民党何尝不想逮捕我，杀害我，不过在下手之前，他们是要考虑后果的。他们愿意杀人如麻不闻声，但这个如意算盘在我身上不容易打。他们因此就另想毒招：把我的声音闷死，使我成为活死尸。不过他们是办不到的”。^②

要窥掘将“声音闷死”的“刀丛”，还需注意到当时的文艺政策及书报检查状况。《〈花边文学〉序言》中说发表的文字“有被抽四次的可能”，“这么说不可以，那么说又不成功，而且删掉的地方，还不许留下空隙，要接起来，使作者自己来负吞吞吐吐，不知所云的责任”。1934年1月18日，上海市各大报被要求文字“涉及左倾或过激者”不得刊载。《申报》副刊《自由谈》主编黎烈文，因刊登左翼作家杂文，遭国民党当局恐吓。2月19日“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奉中央宣传委员会第三十号密函”禁书一百四十九种。6月6日，上海成立“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”，左翼作家的作品及译本都遭查禁。经审查的“每本出版物上，就有了一行‘中宣会图书杂志审查会审查证……字第……号’字样，说明着该抽去的已经抽去，该删改的已经删改”。^③销数不错的《春光》更“不敢好，不准好”。^④《文学》被查禁后，编辑傅东华“请愿转变作风”，“印行前先送审核”。^⑤时常换笔名的鲁迅在1934年12月26日给萧军、萧红的信中说，检查官吏们“遇见我的文章，就删削一通”。甚至鲁迅介绍的稿子，都渺无消息，发表的讲演也须将记录的人名删去，以免连累。《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》的“后半篇都不见了”，《什么是讽刺》《从帮忙到扯淡》等全篇被禁止。在中央查禁系统之外，还存在着严苛的地方审禁机制，如《阿金》被“送到南京中央宣传会”，索回原稿后“第一页上有两颗紫色印，一大一小，文曰‘抽去’，大约小的是上海印，大的是首都印”。^⑥《二心集》改名《拾零集》出版，但在杭州被没收，而“这种残酷的办法，一面固然出于当局的意志，一面也因检查官的报私仇”。^⑦不少“自己站不起，就拖倒别人”的“第三种人”作为检查官，将“禁压，或杀戮‘中国文学的刽子手’之流”看作是“伟大的作品的保护者”。^⑧而“删禁得令人莫名其妙”的原因，一方面是在于示威，另一方面在于饭碗，因为他们“必须常常有成绩，就是不断的禁，删，禁，删，第三个禁，删”。^⑨而1930年代并非“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”。1935年5月上海《新生》周刊发表《闲话皇帝》，因“涉及日本天皇，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即以‘侮辱天皇，妨害邦交’为名提出抗议”。^⑩《新生》周刊被查封，“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”被取消。作为政府帮闲的出版家“除怕被指为‘反动文字’以外，又得怕违反‘敦睦邦交令’了”。^⑪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的鲁迅就这样在鬼蜮般明明暗暗、软软硬硬的围剿下抒写沉淀的苦痛。

中国式的“堂吉诃德”们

酒与鬼关涉的是鲁迅“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迫压”，而中国式的“堂吉诃德”们则映照着鲁迅在上海的斗争姿态。首先需要明晰的是中国式的“堂吉诃德”的指向。创造社对鲁迅的围攻中，成仿吾的《毕竟是“醉眼陶然”罢了》评述鲁迅为“中国的堂吉诃德”，说其所作的《“醉眼”中的朦胧》“暴露了自己的朦胧与无知”。钱杏邨则将鲁迅定性为“一个怀疑现实而没有革命的勇气

①《李秉中致鲁迅信（1936年7月13日）》，《鲁迅藏同时代人书信》，孙郁、李亚娜主编，张杰编著，郑州：大象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362页。

②李霁野：《鲁迅先生的风度》，《天津日报》1956年10月19日。

③④⑤鲁迅：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后记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，第476页，第476—477页，第478页。

④鲁迅：《340511致王志之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3卷，第98页。

⑤鲁迅：《340111致郑振铎》注释7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3卷，第9页。

⑥鲁迅：《且介亭杂文·附记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，第221页。

⑦鲁迅：《341128致刘炜明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3卷，第270页。

⑧鲁迅：《中国文坛上的鬼魅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，第159—160页。

⑩鲁迅：《〈花边文学〉序言》注释8，《鲁迅全集》第5卷，第440页。



① 钱杏邨：《死去了的阿Q时代》，《太阳月刊》1928年第3期。

② 鲁迅：《铲共大观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4卷，第107页。

③ 鲁迅：《文艺与政治的歧途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7卷，第121—122页。

④ 鲁迅：《门外文谈》注释2，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，第105页。

⑤ 鲁迅：《340831致姚克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3卷，第204页。

⑥⑧⑨ 鲁迅：《鲁迅全集》第5卷，第576页，第542—543页，第461页。

⑦ 鲁迅：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，第115—116页。

的人生诅咒者”，说其笔下“不是苦闷的人生，就是灰暗的命运；不是残忍的杀戮，就是社会的敌意”，“没有光明，只是‘呐喊’‘彷徨’”。^①鲁迅在《太平歌诀》中以《申报》所记的无稽谣言和市民表现来说明正视社会现状之必要，更是直言“不是正因为黑暗，正因为没有出路，所以要革命的么”。^②1927年的讲演中，鲁迅说“人类是欢喜看看戏的，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，或是绑出去砍头，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，都可以热闹一下子。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，大家围着去看，他们自己虽然不愿意挨打，但看见人家挨打，倒觉得颇有趣的”。^③鲁迅曾多次记述其在仙台医专所看的幻灯片，《文艺与政治的歧途》里提到的上海民众围看巡捕打人的场景，与幻灯片的画面形成同构，这折射出鲁迅所聚焦的一直都是民众的思想启蒙。可以发现，创造社与鲁迅的争论分歧在于启蒙的必要性。在鲁迅看来，启蒙与救亡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，救亡也并非急功近利的革命，启蒙是救亡的前提，只有民众思想觉醒，国家才不至于沦亡。这也是寓居上海的鲁迅关注的焦点从来不是咖啡馆、跑马场、俱乐部这些带有物质文明标签的地理图示的原因，他在意的是“中国人的生命圈”中的思想情状。

中国式的“堂吉诃德”们在鲁迅笔下指涉的是做戏的现象和蒙昧的状态。1932年1月20日，鲁迅以笔名“不堂”在《北斗》发表《中华民国的新“堂·吉诃德”们》，将青年援马团比作中国式的“堂吉诃德”们。九一八事变后，马占山抵抗日军侵略东北，上海青年组织起青年援马团。而这场虎头蛇尾的抗日表演实在是“做戏”。这些“连体操班也不愿意上的学生少爷”“偏要上战场；政府要诉诸国联，他们偏要自己动手；政府不准去，他们偏要去；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，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；北方是冷的，他们偏只穿夹袄；打仗的时候，兵器是顶要紧的，他们偏只着重精神”。这群1931年12月9日从上海轰轰烈烈出发的学生军，在一·二八事变爆发后认为家门口即可抗日，没必要远走东北，于是四分五裂地收场。这些“都实在打了仗”的一团“堂吉诃德”们就像“提着青龙偃月刀一路唱回自己的家里来了”。鲁迅认为这些“普遍的做戏者”们实是“发热昏”般自我催眠，愚人愚己。

这样堂吉诃德式的做戏在上海轮番上演。1934年6月起，长江流域各省遭旱灾，“国民政府于7月间邀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和安钦活佛在南京、汤山等地‘作法求雨’”，^④而在上海大世界诵经作法求雨的是张瑞龄，鲁迅8月31日致姚克信中讥刺“张天师作法无效”。^⑤《迎神和咬人》中记述长官禁屠的迷信和打帽的妄信：余姚举办迎神祈雨会，一人劝阻迎神，“被大家一顿打，终于咬断了喉管，死掉了”；^⑥1934年7月国民党政府通过《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》，8月27日，山东举行曲阜祭孔大典，南京举办“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大会”，戴季陶演讲《国民文化复兴的开始》；北平、上海、广州、南昌、安庆等地亦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大会，在此之前，广东军阀陈济棠便提议恢复孔丘及关岳祀典，并于3月28日举行“仲春上戊祀关岳典礼”。鲁迅在《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》中讽刺道：“上海的华界虽然接近夷（亦作彝）场，也听到了当年孔子听得‘三月不知肉味’的‘韶乐’”，“余姚的实例却未免有点怕人，所以我们除食肉者听了而不知肉味的‘韶乐’之外，还要不知水味者听了而不想水喝的‘韶乐’”。^⑦《算账》中指出这些行为的虚伪性，即“灾害不过暂时，如果没有记录，到明年就会大家不提起”，而其目的在于“只要尊孔而崇儒，便不妨碍向任何新朝俯首”，孔庙重建等“这些大门面”作为“光荣的事业却是永久的”。^⑧戴季陶还捐款修建吴兴孔庙，在清明时节前往陕西祭扫陵墓。鲁迅在《〈如此广州〉读后感》中揭穿此类事情只是“空名和假样”，“不但是骗别人，骗自己，而且简直是骗鬼了”。^⑨

堂吉诃德式的行为除尊孔外,还有“尊活佛”。1934年3月11日戴季陶等在上海发起组设“时轮金刚法会”。彼时各报载《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启事》的内容,劝人捐助“法资”来“为已故宗亲拔苦,或为现存父母祈福,或消自业,或淡他灾”;4月28日“‘时轮金刚法会’正式开场,由班禅在杭州灵隐寺设置道场,以诵经宣扬‘拔苦、祈福、消灾、超死’等迷信观念”;杭州市工会等九团体发表宣言反对,上海中华爱国协进会亦发表宣言反对,蒋介石为缓和舆论,谓“查此次时轮法会意在慰劳班禅,联络汉、藏情感”,时轮法会的活动至5月15日始结束。^①尽管有舆论反对,鲁迅在《法会与歌剧》中说“坚信的人们一定是有的,要不然,怎么能募集一笔巨款”,^②指国民党官僚以祈祷“解救国难”而举办“时轮金刚法会”等自欺行为玄虚之至,不过是“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”。在“拜佛救国”之外,还有“科学救国”的声音。在“华北华南,同濒危急”时,上海出现了“碟仙”,即“一种迷信扶乩活动,上海曾流传‘香港科学游艺社’制造发售的‘科学灵乩图’,图上印有‘留德白同经多年研究所发明,纯用科学方法构就,丝毫不带迷信作用’等字句”;《偶感》中,鲁迅说这是以科学的名目证明“扶乩的合理”,这种“假汝之名以行”的骗人行为,将科学“化为济私助焰之具”,目的不过是“奖券,亡魂”。^③

堂吉诃德们的共通处便是“将办事和做戏混为一谈”。鲁迅将这些日常上演的剧目,以貌似流于琐碎的笔法记入杂文,构成对周遭环境的隐秘而坚韧的抵抗。1933年10月,上海儿童幸福委员会呈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定1934年为儿童年。12月上海市商会等团体开会,为振兴国货及增强妇女的爱国救国观念,定1934年为妇女国货年。《“小童挡驾”》中,鲁迅将此类“扯淡”行为看作“妈妈”类献身、“儿子”类受谤的做戏。《女人未必多说谎》中更是说妇女国货年“是就要挨骂的,因为国货也未必因此有起色,然而一提倡,一责骂,男人们的责任也尽了”,^④所谓的“儿童年”也只是自导自演,徒有空壳,并无实绩,“虽然是儿童年,虽是前年身历了战祸,也没有因此给儿童创出一种纪念的小玩意,一切都是照样抄”。^⑤

在编讫《且介亭杂文》后,鲁迅说道:“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,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。”^⑥与“追求新、追求时髦的青年人”^⑦不同,面对上海“半租界”的局势变迁,鲁迅以“横站”的姿态打捞历史风土中的政治尘埃,以曲折迂回的笔触寄寓难以言明的心曲。“酒”不仅衬托出有着“桂花白糖伦教糕,猪油白糖莲心粥”等的上海日常消闲的光景,也蕴含着看似波澜不惊的生活之流下现实的张弛缓急。“鬼”则为“斗争的文学”确立靶向,促使鲁迅以更为沉重、冷峻的心态为生活“立此存照”。“堂·吉诃德”们则是鲁迅与错综复杂的环境对话的载体。身处奴隶的境遇中,以一种挣脱奴隶的精神状态的清醒与警觉,来与周遭藏污纳垢之所在相抗争,是鲁迅在历史转调中自觉构建的思想风景。由重重意象所构筑的扭曲的时空结构和枯窘的文化场域,培植出的是保留着拼接弥缝的剪报痕迹,以及于零砖碎瓦中拾荒的杂文光谱。恒钉细碎的日常小事中混融着周延性的政治质素和思想潜流。在“半租界”生活的方枘圆凿中保有思考的自觉与精神的余裕,是“且介亭”杂文的命意所在。让鲁迅驻足低徊的并非十里洋场里声色犬马的物质生活,而是多重文化符码交光互影下个体的认知机制。在夹缝中挣扎、在困窘中斗争的鲁迅,以“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癍痕”,绘制出“半租界”亭子间生活的城市视景和心灵滑音。

编辑 屠毅力

① 以上参见《中华民国史·大事记》第七卷(1934—1936),韩信夫、姜克夫主编,北京:中华书局,2011年,第4644—4645页。

②③④⑤ 鲁迅:《鲁迅全集》第5卷,第475页,第505—506页,第446—447页,第523页。

⑥ 鲁迅:《且介亭杂文·附记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,第221页。

⑦ 张笑鸣:《施蛰存:执著的“新感觉”》,《社会科学报》2003年12月4日。